

# 中国为何不愿使用经济制裁？

白联磊\*

**摘要：**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长期排斥经济制裁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奇特现象。中国曾经实施的经济制裁具有次数少、防御性、有限支持多边制裁、不涉及意识形态等特征。既有研究缺乏关于该问题的直接讨论，相关文献具有两点缺憾，一是制裁政策的静态假设；二是忽视制裁成本的作用。探究中国长期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原因，需要回到经济制裁的本质，并使之具有动态特征。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数理模型，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思路，证明经济优先战略和经济权力滞后是导致中国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认为中国维持经济优先战略的内外条件正在消失，提升国际经济权力的决心日益增强，中国对经济制裁工具的排斥将逐渐减弱。

**关键词：**经济制裁；经济优先；经济权力；经济收益；政治收益

经济制裁是指在国际事务中以强制性的经济手段达成非经济目的的行为。<sup>①</sup>作为外交工具的经济制裁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已经得到使用，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制裁工具的使用日益精细化，适用范围也日益广泛，在许多国际纠纷中，经济制裁由于成本更低而成为军事手段的最佳替代方案。<sup>②</sup>然而，相比其他大国，中国更加排斥经济制裁，并且明确宣示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sup>③</sup>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与长期排斥经济制裁并存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奇特现象。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来自两大因素，即国内层面的经济优先主义和国际层面经济权力的相对落后。这两大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中国对经济制裁的态度发生变化。

本文接下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中国排斥经济制裁的经验事实，并指出（1）对合法性和成功率的担忧不构成中国排斥经济制裁的主要原因，（2）既有文献对该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存在若干有待改进之处；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包含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数理模型，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思路，证明经济优先战略和经济权力滞后是导致中国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重要原因，进而作者认为经济优先战略的退出和国际经济权力的增强，正在弱化中国对经济制裁工具的排斥态度，丰富中国外交政策工具箱需提上日程。第三部分为简要总结。

## 一、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经验归纳与文献回顾

### （一）中国排斥经济制裁的经验事实

中国政府从未明确宣称制裁任何国家、实体或个人，并且认为美国援引国内法发动对外制裁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sup>④</sup>但是，如果将未经宣示的制裁也包括在内，并非从未动

---

\*白联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sup>①</sup>在经济制裁的经典著作《反思经济制裁》中，经济制裁被定义为“蓄意的、由政府发起的、断绝或威胁断绝惯常贸易或金融关系的行为。”尽管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经济制裁包含以经济手段实现经济目的的情形，例如因贸易政策而出现的贸易制裁等，但是更普遍的情形是以经济手段实现非经济目的。见霍夫鲍尔等：《反思经济制裁》（第三版），杜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sup>②</sup> Robert A.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2, 1997, pp. 90-136.

<sup>③</sup> 《中方：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中国新闻网，2014年5月7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07/6145762.shtml>，访问时间2015年3月28日。

<sup>④</sup>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援引国内法制裁中国金融机构》，中国新闻网，2012年8月1日。

用类似经济制裁的政策工具。根据霍夫鲍尔等人的研究，自新中国成立到 2006 年，中国曾经发动过三次对外经济制裁，分别是 1978 年为报复阿尔巴尼亚反华言论而中断对阿经济援助、1978 年为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停止对越经济和军事援助<sup>①</sup>、1992 年中国为迫使法国停止对台军售，撤销了拟议中的部分中法大型合作项目以及停止进口法国小麦。阎梁（2012）认为，具有强烈经济制裁色彩的案例还包括（1）2008-2009 年达赖访法前中国对法隐含地制裁威胁，以及达赖访法后中国部分航空公司取消或推迟与法国空中客车公司的合同；（2）2010 年奥巴马总统宣布对台军售决定后，中国发出对相关美国公司的制裁警告；（3）2010 年中日钓鱼岛风波中中国宣布暂停对美日稀土出口等。<sup>②</sup>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世界大国中发动单边经济制裁次数最少的国家（图 1）。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仅因法国售台武器问题、达赖访法问题等实施过未言明的经济惩罚。在霍夫鲍尔等设计的经济制裁数据库中，中国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发动经济制裁次数最少的国家，1949—2006 年仅发起过 3 次经济制裁，而美国则发动过 116 次，77 个国家遭受过或正在遭受美国的经济制裁，其中 26 个国家遭受过两次以上的美国制裁。（图 1）即使作为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加拿大、日本和印度，在发动经济制裁的次数方面也不逊色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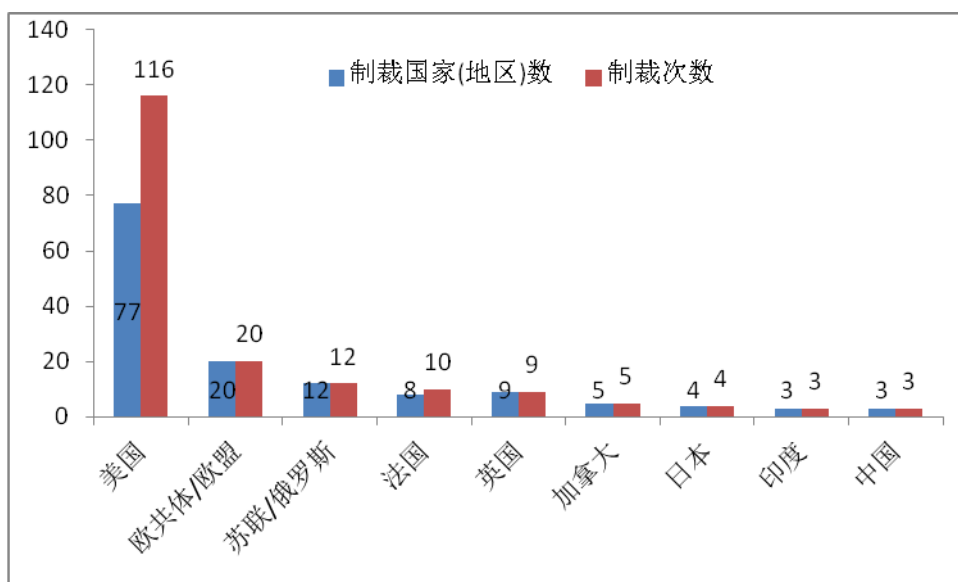


图 1：1949 年以来世界主要大国以外交目的发动经济制裁的情况

资料来源：：霍夫鲍尔等：《反思经济制裁》（第三版），杜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46 页。

通过与其他大国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对外制裁次数少与以下现象有密切关系：第一，中国单边经济制裁是防御而非进攻工具。经济制裁是一种政策工具，既可用于防御亦可用于进攻。西方大国之所以实施对外经济制裁，往往不是因为本国利益受到损害，而是扩张既有收益，表现强烈的进攻性和扩张性。我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出发点则是维护而非扩张利益。在仅有的少数制裁案例中，我国动用经济制裁的目的是惩罚对我国国家利益的侵犯行为，被侵犯的国家利益又往往是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如达赖喇嘛问题、台独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第二，中国单边经济制裁与意识形态无关。意识形态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经济制裁的重要因素。二战后至 2006 年，全世界发生的主要经济制裁有 116 起，其中以推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8-01/4073848.shtml>，访问时间，2015 年 4 月 6 日。

<sup>①</sup>按照霍夫鲍尔等人的认定标准，中断经济援助也被视作经济制裁。另外需要注意的两点，首先，从国际经验看，对外经济援助往往与双边贸易联系密切，中断援助必然影响贸易状况；第二，中国暂停对阿、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事实上可以看作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一部分。（霍夫鲍尔等，2011）

<sup>②</sup>阎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外交评论》，2012 年第 6 期，第 24-27 页。

进民主或人权为目标的经济制裁占 26%。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被称作“制裁时代”，10 年内发生 59 起制裁，其中有 26 起直接针对民主或人权问题，有 4 起针对“独裁”政府和民主人权，有 5 起是为了支持民族自决或自治。<sup>①</sup>中国发起的经济制裁或准经济制裁，则全部与意识形态无关，体现了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风格。第三，中国反对单边制裁，有限度参与多边制裁。中国长期反对单边经济制裁，尤其是全面制裁，但是承认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经济制裁具有合法性。为应对朝核、伊核问题、反恐问题等导致的国际危机，中国逐渐增大了对相关多边制裁的支持和参与力度。例如，2006 年朝鲜启动核试验之后，中国曾拒绝参加联合国对朝鲜的全面经济制裁，而仅执行针对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及对朝鲜最高层的选择性制裁。2013 年，面对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的局面，中国支持加大对朝制裁力度，由此安理会达成了 2094 号决议，实施包括金融、航运等在内的更严厉制裁。2016 年 1 月 6 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安理会宣布将立即着手起草包含相应行动的新的安理会决议。中国主张，安理会可通过新决议，采取进一步措施，使朝为其行为付出必要代价，承担相应后果。<sup>②</sup>在反恐方面，中国亦支持安理会制裁“伊斯兰国”的决议，试图通过包括资金冻结在内的国际制裁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上述特征与制裁次数少这一事实相结合，显示出中国对使用经济制裁持相当审慎的态度。

## （二）已有解释及其不足

由于中国对经济制裁的排斥是一种长期现象，因而需要在规律性层面寻找原因。直观的思考会将制裁的成功率和制裁的法律基础作为两个重要变量。但是基于既有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可能难以构成国家发动经济制裁的真正障碍。

首先，关于制裁成功率的讨论仍无定论。关于经济制裁成功率的研究往往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对于较为乐观的研究者而言，这个数字也只有 34% 左右<sup>③</sup>，而在较悲观的批评者看来，排除军事因素的影响后，制裁成功率则不到 17%<sup>④</sup>。于是很自然的一个推论是，经济制裁的低成功率会弱化国家使用经济制裁的意愿。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制裁成功率“很低”的情况下，经济制裁的使用频率并未明显降低，甚至有升高的趋势。不过，一些研究者指出这其实是一个假象，理由是人们对“成功制裁”的定义存在问题。Francesco Giunelli（2013）指出，多数研究将制裁政策之下目标国做出退让视作制裁成功的标志，但是事实上，目标国的行为改变并不是制裁的唯一目的。约束目标国的行为，甚至向其传递明确信号都属于制裁的目标。<sup>⑤</sup>Drezner(2003)则指出，经济制裁的成功案例应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制裁威胁产生作用的案例，第二部分是制裁威胁失败后，通过实施制裁达成目标的案例，而人们往往忽略第一部分，从而造成制裁成功率低的假象。将两类案例统一考察之后，他发现经济制裁平均的成功率在超过 56%，为推进环境监管而发出的制裁/制裁威胁的成功率甚至达到 72.37%。<sup>⑥</sup>但是这种论点又必然引发关于经济制裁定义的争论。由于有关制裁成功率的争论仍无定论，目前还无从判定制裁成功率是否影响了国家对经济制裁工具的选择。因此，通过经验数据得出的制裁成功率可能并不是影响国家制裁决策的关键变量。

<sup>①</sup>霍夫鲍尔等：《反思经济制裁》（第三版），杜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3-46 页。

<sup>②</sup>《王毅接受路透社专访谈叙利亚和半岛核问题》，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 年 2 月 13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40286.shtml>，访问时间 2016 年 2 月 14 日。

<sup>③</sup>霍夫鲍尔等：《反思经济制裁》（第三版），杜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6 页。

<sup>④</sup> Robert A.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 2, 1997, pp. 90-136.

<sup>⑤</sup>Francesco Giunelli, “How EU sanctions work: A new narrative”, *CHAILLOT PAPER* No. 129 — May 2013.

<http://www.iss.europa.eu/publications/detail/article/how-eu-sanctions-work-a-new-narrative/>，访问时间 2015 年 4 月 6 日。

<sup>⑥</sup>Daniel W.Drezner, “The hidden hand of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3, pp. 643-659.

其次，法律障碍其实并非不能克服。对关于制裁的法律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发动制裁的主体既有主权国家亦有国际组织，而制裁的法律来源既可以是国际法也可能是国内法。在国际层面，《联合国宪章》第41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得决定使用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此项办法得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sup>①</sup>这成为安理会发动经济制裁及成员国执行该决议的法律基础。<sup>②</sup>在区域组织层面，欧盟、非盟等国际组织均被成员国授权发动对外制裁。其中，欧盟执行对外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主要来自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和欧盟基础条约中对使用“限制性措施”的规定，其中《欧盟运行条约》（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215款是核心条款，它规定欧盟可以通过中断与第三国的经济关系以达到政治和外交目的，并且这种限制性措施适用于以自然人和法人为目标的制裁行动<sup>③</sup>。在国内法层面，关于经济制裁的立法包括两部分，一是为承担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义务而进行的配套立法；另一类为实施单边经济制裁而进行的立法。<sup>④</sup>由于国家经常援引国际法建立相应的国内法，且基于国际法原则发动单边经济制裁的案例并不鲜见（如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意味着对打算发动对外制裁的国家而言，法律问题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缺乏一致的衡量标准导致我们很难断定制裁成功率能对国家制裁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制裁成功率的疑虑也不应被视作中国长期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主要原因；（2）缺乏合法性的问题并非不可克服，因此法律基础也不能被视作中国长期排斥经济制裁的决定性因素。

上述探讨的结论令人沮丧，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到经济制裁文献中寻找答案。梳理经济制裁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大量作者将主要精力用于探讨经济制裁效果<sup>⑤</sup>，却很少解释国家为什么以及何时会发动经济制裁（Drezner, 1998）。在仅有的少数文献中，霍夫鲍尔和斯科特等（2011）将国家发动制裁的动机简单总结为三条：一是显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惩罚、阻止或威慑冒犯本国权威的行为；三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如呼应国内惩罚不义之举的热情以收买人心等。但是，至于国家在何种情况下会将这些动机化为实践，霍夫鲍尔等并未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Drezner（1998）将这类问题纳入博弈论框架内讨论。他发现，当制裁发起国预期到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较大时，便倾向于发动经济制裁，即使此时发动制裁的经济成本很高；当制裁发起国的冲突预期较低时，发动经济制裁的意愿也随之降低，除非此时的制裁成本极低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极大。<sup>⑥</sup>但是，经济制裁决策的影响因素不可能局限于国际层面，国内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实关注制裁决策的国内因素的文献在经济学领域已经非常丰富，例如，Kaempfer and Lowenberg（1988）从公共选择路径讨论了经济制裁的多目标问题。他们将国内收益集团的影响纳入国家对外经济制裁的决策框架，并证明收益集团为了自身收益推动经济制裁会提高了经济制裁的成本，却不能给目标国造成最大伤害。<sup>⑦</sup>Drury（2001）对此作了改进，他同时考察了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并对7个假设进行了实

<sup>①</sup>《联合国宪章》<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访问时间2015年4月6日。

<sup>②</sup>参见 Monika Heupel, “Multilateral Sanctions against Terror Suspects and the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2, 2009, pp. 307-321

<sup>③</sup>顾婷：《欧盟对外制裁制度的法律解析——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研究》，2013年第3期，第90页。

<sup>④</sup>黄风：《金融制裁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sup>⑤</sup>关于经济制裁相关议题的文献回顾可参见阮建平：《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理论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刘建伟：《国际制裁研究：路径、议题及不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5期；Yitan Li, “US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anction Effectivenes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8, 2014, pp.312-317.等。

<sup>⑥</sup>Daniel W. Drezner, “Conflict expectations and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1998, pp. 709-731.

<sup>⑦</sup>William H. Kaempfer and Anton D. Lowenber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 Public

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美国总统发动制裁的意愿与国际冲突的紧张程度和国内失业率成正比，与目标国的挑衅性成反比，而国内选举周期对总统的制裁决策无影响。<sup>①</sup>张曙光（2010）认为对经济制裁决策的分析，应包括对政治和安全目的的认识、对目标国威胁的认知、制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匹配性、制裁的利弊得失、政治心理的影响五个层面。<sup>②</sup>

简而言之，既有文献在讨论影响国家对外制裁决策的因素时多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展开。客观维度如国际冲突的紧张程度、国内失业率、利益集团的作用等；主观维度如国家对冲突前景的判断、目标国的挑衅程度等。如果考虑到经济制裁的象征意义，则需要加上维护国家威望的意愿、国内政治的需要等。这种综合主观和客观、国际和国内的综合视角对后续研究具有借鉴意义，而其不足之处在于制裁政策的静态性假设，即在事件层次考察制裁的影响因素，以至缺少具有广泛适用性的规律性结论。

由此可以发现，研究“经济制裁的促发因素”的文献，多将研究对象置于外交政策学框架内考察，不涉及国际权力结构和国家战略的变化。但是，中国排斥经济制裁工具是一个长期现象，基于特定冲突案例的经验研究难以提供有力的解释。另外，既有研究常常忽视制裁成本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制裁的相关研究中，制裁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变量<sup>③</sup>。在国家的经济制裁决策中，制裁成本与制裁收益的权衡更是核心内容，而对成本收益的估计则受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因此，要探究中国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原因，需要回到经济制裁的本质——国家在经济成本与政治收益之间的权衡，并使之具有动态特征。为此，本文将引入国内层面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层面的权力格局两个因素，探讨它们对国家经济制裁决策的影响。

## 二、中国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数理解释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外交领域主要体现为“外交为经济服务”<sup>④</sup>。时殷弘（2006）将这一现象称作中国外交战略基本目标的“经济化”或“经济第一”<sup>⑤</sup>，但是他并未具体阐释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及这种政策取向如何影响了对外交政策工具的选择。接下来本文将探寻经济优先战略形成的根源，证明经济优先战略是导致中国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重要原因；之后本文将证明，经济权力滞后是中国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一）经济优先主义与制裁排斥

经济优先是指国家在实施对外政策的过程中，着重维护经济收益的增长，甚至为了维护长远经济收益在国际事务中暂时忍让。

假设国家为理性行为体，追求收益最大化。国家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政治收益、军事收益等。为简化起见，我们将国家收益分为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由于国家生存和发展同时需要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二者缺一不可，且存在“木桶效应”，因此，我们借鉴柯布道格拉

---

Choice Approac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o. 4, 1988, pp. 786-793

<sup>①</sup> A. Cooper Drury, “Sanctions as Coercive Diplomacy: The U. S. President's Decision to Initiate Economic Sanc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4, No. 3, 2001, pp. 485-508

<sup>②</sup> 张曙光：《经济制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sup>③</sup> John Sho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source country: how economic sanctions imposed on China affect the U.S.”, *Global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5, No.5, 2011, pp.2-3.

<sup>④</sup> 《杨洁篪：外交要直接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网，2009年03月07日。

<http://lianghui2009.people.com.cn/GB/145749/8923318.html>，访问时间，2015年3月16日。

<sup>⑤</sup> 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2-44页。

斯生产函数的形式，设定国家收益的形成函数为  $I = E^\alpha P^\beta$ 。

其中  $I$  为国家收益， $E$  为国家经济收益， $P$  为国家政治收益， $\alpha$  和  $\beta$  分别表示经济收益增长率和政治收益增长率在国家收益增长中所占权重。由于国家收益仅仅包括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两种，因此令  $\alpha + \beta = 1$ 。

收益扩展是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为此，我们设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效用函数为  $U = \alpha \ln E + \beta \ln P$ ，令经济收益增长率  $\ln E = e$ ，政治收益增长率  $\ln P = p$ ，则  $U = \alpha e + \beta p$ 。

假定用于增加国家收益的资源为常数  $A$ ，用于增加经济收益的资源所占权重为  $0 < \mu < 1$ ，用于增加政治收益的资源所占权重为  $0 < \nu < 1$ ，且  $\mu + \nu = 1$ 。则

$$U(A) = \alpha e(\mu A) + \beta p(\nu A) \quad (1)$$

(1) 式等号两边对  $A$  求导得

$$\frac{\partial U(A)}{\partial A} = \alpha \left( \mu \frac{\partial e(A)}{\partial A} + \nu \frac{\partial p(A)}{\partial A} \right) \quad (2)$$

当  $\frac{\partial e(A)}{\partial A} > \frac{\partial p(A)}{\partial A}$  时，等量资源用于拓展经济收益的回报率高于政治收益。对追求收益最

大化的理性国家而言，必然将有限资源投入经济收益拓展，此时， $\frac{\partial U(A)}{\partial A}$  越大  $\nu$  越小。这可以

看作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政治格局相对稳定的情形，此时国家会将更多资源用于培育和增加国家经济收益。

当  $\frac{\partial e(A)}{\partial A} < \frac{\partial p(A)}{\partial A}$  时，等量资源用于拓展政治收益的效率高于拓展经济收益， $\frac{\partial U(A)}{\partial A}$  的值与  $\nu$

成正比，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国家会将有限的资源更多用于扩展政治收益。这可以看作国家经济经历长期增长、经济赶超空间变小、经济增速趋缓的情形，此时依托于经济实力的政治收益增长愈益紧迫，国家会转而着力于拓展政治收益。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国家执行经济优先主义的外交战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其目标是实现国家收益的最大化；第二，经济优先的外交战略并非长久不变，而是具有阶段性，可用于判断这种战略转变的关键指标是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经济制裁的目标是以经济成本换取政治收益，换言之，存在经济收益向政治收益的转换机制。令经济制裁时经济收益增长率损失为  $me$ ， $0 < m < 1$ 。国家正常的政治收益增长率为

常数  $p^*$ ，在经济制裁中，经济收益向政治收益的转换率为函数  $h(me) = \frac{\Delta p}{p}$ 。令  $h' > 0$ ， $h'' < 0$ ，

表示实施经济制裁的收益与成本成正比，但边际收益增长率与经济成本成反比。由此得到包

含经济制裁的国家对外政策效用函数  $U = \alpha(1 - m)e + \beta(p^* + h(me))$

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经济收益向政治收益的转换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逆的特点，即

$$\frac{\partial P}{\partial E} < 0, \frac{\partial E}{\partial P} = 0。此时国家要实现收益最大化必有：\frac{\partial U}{\partial e} = \alpha(1-m) + \beta mh'(me) = 0$$

令 $\frac{\beta}{\alpha} = \lambda$ 代表政治收益的增加在国家对外政策效用函数中的相对权重，则有

$$\frac{1}{m} = 1 - \lambda h'(me) \quad (3)$$

因为 $m > 0$ ，所以 $1 - \lambda h'(me) > 0$ ，因此(3)式等号两边对 $\lambda$ 求导得 $\frac{1}{m^2} \frac{\partial m}{\partial \lambda} = h'(me) > 0$ ，

即 $\frac{\partial m}{\partial \lambda} > 0$ ，同理 $\frac{\partial m}{\partial h'(e)} > 0$ ，

由此得到命题 1：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国家发动对外经济制裁的意愿与对政治收益的重视程度 $\lambda$ 和经济制裁效率 $h'(me)$ 成正比。

$\lambda$ 是一个难以直接观测的指标，但是替代指标是存在的，即国家为扩展政治收益所投入的资源。这一指标是可以观察的，以国家的组织和智力资源投入为例，中央部委中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的部委有 13 个<sup>①</sup>，超过总数的 50%；国务院直属机构中与经济事务相关的有 8 个<sup>②</sup>，占总数的 50%；中国最大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包含经济学科的研究所有 16 个<sup>③</sup>，占比也超过 50%。<sup>④</sup>显然，从长时段来看，组织及智力资源投入越多，意味着国家对此类问题更为重视。因此，令 $\lambda$ 为 $\mu$ 的增函数，即 $\lambda'(\mu) > 0$ ，令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 $\lambda$ 的值为 $\lambda_1(\mu_1)$ ，经济增速下降时期 $\lambda$ 的值为 $\lambda_2(\mu_2)$ ，则必有 $\lambda_1 < \lambda_2$ 。由此得到推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家对政治收益的重视程度弱于对经济收益的重视程度，使用经济制裁工具维护政治收益的意愿较弱。

## （二）经济权力滞后与制裁排斥

根据摩根索的定义，“权力指的是人对他人的思想和行动控制力量。”<sup>⑤</sup>但是这仅仅是权

<sup>①</sup>这些部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包括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sup>②</sup>这些机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旅游局。

<sup>③</sup>这些研究所包括：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经战略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欧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

<sup>④</sup>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当前中国存在明显的经济优先主义。

<sup>⑤</sup>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7 页。

力的最直接体现。在更多情况下，权力的作用是在未经言明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权力的分布构成国际体系的结构，结构决定单元的行动。对中国而言，“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外交的选择范围，成为影响外交决策和行为的首要因素。”<sup>①</sup>权力结构的持久性特征，意味着它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制裁战略。

此处我们界定权力为规则性权力，最典型的表现是在重大国际组织内的投票权、规则制定权、话语权等。中国的国际经济权力具有滞后性，既滞后于国际政治权力亦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实力。中国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审议的重大事务具有否决权，这是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最显著的标志。中国在 1971 年即加入联合国，至今已 40 多年。此外，中国是世界仅有的五个合法核大国，对国际防核扩散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最为关键的是，在国际政治的权力格局中，至少在投票权等规则性权力中，践行权力制衡原则，典型体现就是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具有同等的一票否决权。但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迟至 2001 年才加入 WTO，且长期缺乏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在重要多边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和 IMF 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与自身的经济体量不匹配。2013 年，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比重超过 12%，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仅有 3.65%，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仅有 4.42%。此外，这些重大国际经济组织并未援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制衡原则，而是根据成立之初的国家经济实力确定投票权，美国一家独大，长期持有两大组织唯一的一票否决权。

与上文的国家对外政策效用函数相匹配，假设在全球权力结构中中国的权力类型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两种，它们共同决定国家的全球地位。

令国家政治权力为常数 1，经济权力为  $F_E$ 。因此， $F_E$  还可以表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程度。当两种权力不对称时，国家倾向于使用优势权力保卫收益，而对手国家也倾向于使用自身优势权力发动攻击，因此权力既是攻击手段又是防御手段。经济制裁是保卫和扩展国家收益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制裁中，权力的攻击性体现在对本国收益的维护效果，权力的防御性体现在遏制对手反击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既影响制裁收益又影响制裁成本，因此本文将包含权力因素的经济制裁效率函数设定为

$$h(me) = a(me)^{F_E} - \frac{me}{F_E} \quad (4)$$

在这个函数中，制裁收益为指数函数  $a(me)^{F_E}$ ，表示经济制裁的收益与国家经济权力密切相关，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权力越大，对外制裁的收益也越高，这刻画了经济制裁收益的客观维度。函数中的  $a$  代表国家对具体制裁事件的重视程度，它与制裁收益成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在其他条件给定时，重视程度越高意味国家所理解的制裁收益越高（当然，愿意承担的成本也越高），这刻画了经济制裁的主观维度。经济制裁的间接（远期）成本函数为  $me/F_E$ ，意味着相对于经济制裁的直接（暂时）成本  $me$ ，经济制裁的间接成本（或远期成本）要受到经济权力的影响，且二者成负相关关系。其经验理由在于，国家经济权力越强就越能够威慑对手国家的经济报复行为，所遭受的潜在损失也越小。

---

<sup>①</sup>陈小鼎，刘丰：《结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构建与拓展——兼论对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启示》，《当代亚太》2012 年第 5 期，第 7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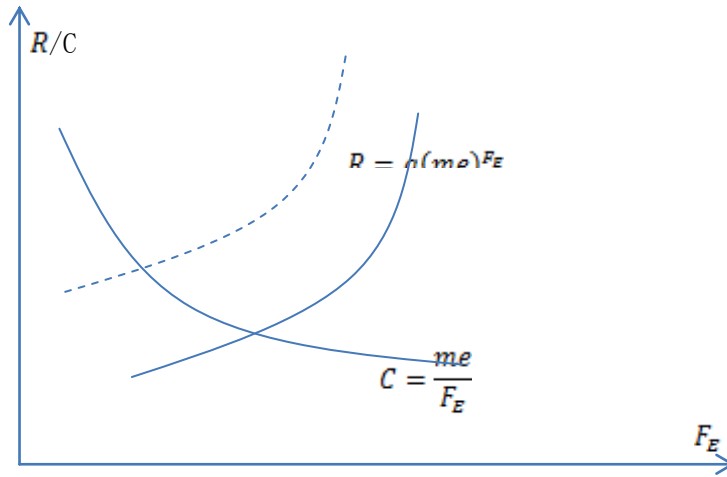


图 2：国家发动经济制裁的成本收益示意图

注：R 代表收益，C 代表成本，虚线代表国家越重视，收益曲线越高。

由此形成扩展的对外政策效用函数  $U = \alpha(1 - m)e + \beta \left( p^* + a(me)^{F_E} - \frac{me}{F_E} \right)$ 。此时，国

家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  $\frac{\partial U}{\partial F_E} = 0$  即  $\alpha(1 - m) + \beta m \left( aF_E (me)^{F_E-1} - \frac{1}{F_E} \right) = 0$

等号两边对  $F_E$  求导得：

$$\frac{\partial m}{\partial F_E} = \lambda m a (me)^{F_E-1} (F_E^{-2} + F_E \ln F_E) \quad (5)$$

由于  $F_E^{-2} + \ln F_E > 0$ ，故  $\frac{\partial m}{\partial F_E} > 0$ ，也即  $\frac{\partial m}{\partial F_E^{-1}} < 0$ 。由于本文假定国家政治权力为常数 1，

则  $F_E^{-1}$  表示国家政治经济权力的不匹配系数（也即政治和经济权力之比）。

由此得到推论 2：在国际体系内，国家的经济权力相比政治权力越弱，发动经济制裁的意愿越低，也越排斥经济制裁工具。

需要指出，这一推论的另一现实基础在于，国际政治权力占优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际经济权力的不足。事实上，权力的不均衡必然使优势权力弥补弱势权力成为常态，例如美国在遭遇不均衡衰落（即在一个或多个议题领域失去优势地位）时便往往利用其在优势领域的力量弥补其弱势领域。<sup>①</sup>我们将此种现象称之为“国际政治权力的红利”。对中国而言，这种红利同样存在。由于在国际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中的特殊地位，中国可以在相关议题上施加重要影响，不仅牵制他国外交政策走向，亦能间接护佑中国的经济收益扩展。例如在联合国制裁伊朗问题上，中国竭力在履行防扩散义务和保护在伊石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将中国经济利益的损失降到最低。

<sup>①</sup>A.A. Stein, “The Politics of Linkage”,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1, 1980, pp. 62.

### （三）正在出现的趋势

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优先主义的存在条件是经济收益的扩展效率高于政治收益的扩展效率。这一状况的形成得益于两个前提。其一,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相对稳定,且中国的国际政治收益已接近极限。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便开始实行结伴不结盟政策,致力于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务实外交,从而主动收缩了政治收益的范围;加入联合国使中国获得了超出自身经济地位的政治大国地位,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以国际政治地位为代表的政治收益扩展已达极限。其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为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具备实现经济腾飞的巨大潜力。中国具备实现后发赶超的一系列内外条件,如有利于工业化的巨大人口红利、促进技术赶超的后发优势、国际产业转移的千载良机、冷战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冷战后的历届中国政府摒弃意识形态分歧,致力于拓展经济收益,谋求与他国的合作共赢。

当前,上述两个条件正在发生改变。首先,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从国内角度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增长,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显著下降。<sup>①</sup>近期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具有鲜明的经济含义,但是由于所涉区域多为欠发达地区,而且面临政治、安全等多重风险,很难实现中国“转移过剩产能”、“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等经济目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内部的经济问题几乎不可能依靠经济欠发达的沿线国来解决。<sup>②</sup>从国外角度看,中国海外经济收益的扩展逐渐面临政治和安全约束。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给中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sup>③</sup>,而后危机时代主导收益分配的“利比亚之友”也只给予中国观察员地位,凸显了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软肋。2014年9月,在南苏丹内战的安全威胁日益迫近之际,中国首次决定派遣战斗部队担负维和任务,将在事实上维护中国在南苏丹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其次,中国扩展国际政治收益的外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快速崛起,中国不再仅仅是跛足大国,而是在经济总量、军费开支等方面均名列世界第二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担负更大国际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自身也在推行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战略。中国实现外交抱负所需要的国际政治权力与现实拥有的国际政治权力之间的差距将持续缩小。考虑到中国的崛起态势仍将继续,中国外交抱负的伸张意味着中国运用国际政治权力的频率和强度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代表的既有国际政治权力格局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当前联合国成员的规模与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安理会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以扩员为重点的改革必然削弱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和权力。<sup>④</sup>

命题1及推论2表明,经济权力不足导致的制裁效率低下是导致制裁工具遭到排斥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权力不足体现在经济权力弱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谋求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多边金融机构中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投票权和话语权,并致力于获取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但是,由于权力的零和性质,中国的经济权力诉求遭遇了重重阻碍。以IMF改革为例,2010年IMF的改革方案计划将6%的投票权由代表性过高国家转移到代表性不足国家,但是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这一改革方案拖长达四年才于2015年12月落实。国际经济秩序的“体制内改革”受阻迫使中国寻求在“体制外尝试”。2014年以来,中国在继续推进多个自贸区谈判、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加强金砖国家协调与合作,推出“一带一路”

<sup>①</sup>邵伏军, 苟文均, 匡桦:《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与政策响应》,《金融研究》,2014年第12期。

<sup>②</sup>薛力:《“一带一路”折射的中国外交风险》,FT中文网,2014年12月30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9886?page=4>,访问时间,2015年3月26日。

<sup>③</sup>据不完全统计,仅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233亿元。参见冷新宇:《利比亚危机,中国损失怎么办?》,《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05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5/24/c\\_121452193.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5/24/c_121452193.htm),访问时间,2015年3月26日。

<sup>④</sup>李东燕:《中国与安理会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第18页。

战略构想，并配套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制。这既是对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补充，更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缓慢的有力回应。即使短期内提高中国的国际经济权力仍面临复杂挑战，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庞大基数，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快得多的增长速度，中国国际经济权力的提升是大势所趋。

### 三、结语

在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假设下，国家是否使用经济制裁工具，取决于对成本和收益的衡量。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对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国家而言，国家是否倾向于使用经济制裁工具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国家对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的权衡；第二，经济制裁效率，这涉及达到同样目标需要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本文认为，中国当前执行了经济优先主义的发展战略，并面临国际经济权力滞后的局面。经济优先意味着在国家对外政策效用函数中，扩展经济收益比拓展政治收益更重要，因此必然排斥经济制裁工具的使用；中国经济权力的滞后意味着当中国主动发起经济制裁时，有限的经济权力不足以抵御他国的反制裁，由此带来的高昂制裁成本削弱了中国使用经济制裁工具的意愿。

当前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潜力逼近极限，海外经济收益面临政治和安全约束，国际政治权力格局面临重新调整压力，意味着中国维持经济优先主义的内外条件正在消失。<sup>①</sup>中国积极构建新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提出多样化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努力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战略影响力，实现投票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与经济贡献相匹配，意味着中国正在为提升国际经济权力夯实基础。经济优先主义的弱化和中国经济权力的提升，必将导致中国对经济制裁工具的排斥随之减弱。对外交决策者而言，过去偏重政治和外交手段的政策工具箱正在变得过时，而一个包含经济制裁在内的更均衡的政策工具箱将为中国外交增添新的动力。

## Why Is China Unwilling to Employ Explicit Economic Sanctions?

BAI Lian lei

**Abstract:** There has long been a paradox that China dislike employing the instrument of economic sanction while its economic strength increases rapidly. In effect, China has mad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 for several times but with a quite low frequency, very defensive posture, resolutely opposition to unilateral sanction, no involving ideological factor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arely talks about this topic, and relevant research papers explores why and when a country will initiate an economic sanction, but are weakened by two flaws: one is the hypothesis of static strategy, and the other is neglecting the role of sanction cost. An improved approach for exploring the reason of China's unwilling to use economic sanction must retreat to the nature of economic sanction, namely the trade-off between economic cost and political benefit, and put the discussion in a dynamic condi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mathematical model, taking accoun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with dynamic feature.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is applied in the model to induce an key conclusion that economic priority

---

<sup>①</sup>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尤其是中国政府所赋予它的“公共产品”性质，已经表明中国正在力图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其外交战略的立足点正在从经济收益为主转向战略收益和经济收益并重。参见《王毅：“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新华网，2015年03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3/c\\_1114735852.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3/c_1114735852.htm)，访问时间，2015年3月26日。

and lagging economic power of global level are very significant in curbing China's employment of economic sanctions. Last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beneficial China's exclusion to economic sanction are fading, China is trying to strengthen i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wer, and China's rejection to the instrument of economic sanction is weakening.

**Key Words:** economic sanctions; priority on economics; economic power; economic benefit; political benefit.